

共政策詭譎多變，讓人難以捉摸，也就很難和它長期爲友。

在最近的將來，非洲仍是一個多事之區，羅德西亞乃至那密比亞等問題能否順利解決，仍在未定之天。

據美國國務院專家估計，目前大約有四萬二千名古巴人（爲其全部武裝部隊的四分之一）在非洲大陸，其中包括二萬軍隊在安哥拉以及一萬七千名在衣索匹亞。據報導，現今非洲所進行的八個局部戰爭中，蘇聯和古巴已直接或間接介入的共有六個，即：羅德西亞、那密比亞、薩伊、安哥拉、厄立特里亞以及衣索比亞與索馬利亞族人之間的衝突。當然，我們並不認爲蘇聯的擴張，在非洲一定會得逞，因爲：（一）非洲國家衆多、種族複雜，彼此矛盾衝突甚多，蘇聯所爲常被捲入漩渦而顧此失彼，它在中東的失敗，在衣索之間的躊躇，均其適例；（二）非洲國家多數不喜歡共產主義，蘇聯實力擴張過速，必將引起當地國家的警惕與抵抗；（三）西方在非洲的影響力，仍然不可輕侮，如其對非政策因應得宜，蘇聯未必能佔上風。

中共除有與蘇聯同樣的困難外，更有政策多變及實力不足的缺點，它雖與蘇聯在若干方面均針鋒相對，但其經由東方再到西方的赤化世界陰謀，則與蘇聯全無二致。非洲國家也不乏有識之士，當他們在政治上愈臻成熟之際，中共的失敗公算，將較蘇聯更多。

中共與阿爾巴尼亞的合與分

畢英賢

前言

阿爾巴尼亞是巴爾幹半島、亞得里亞海濱的一個小國，土地兩萬八千平方公里，人口兩百五十萬；但在中共與蘇共的對立鬥爭中，却曾扮演一個突出的角色。一九六〇年代初，中共與阿爾巴尼亞共黨共同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成爲親密伙伴。在整個六十年代內，中共是阿爾巴尼亞的唯一的軍事與經濟援助者；阿爾巴尼亞是中共意識形態的追隨者。有了阿爾巴尼亞，中共在「社會主義」國家間才不至陷於完全孤立，且在反蘇言論上有了一個轉播站。

一九七一年北平外交戰略轉變，試圖接近美國，阿爾巴尼亞不以爲然；雙方對國際問題的看法，也各走一端。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阿共機關報「人民之聲」發表一篇題爲「革命理論與實踐」的長文，痛斥中共的「三個世界」理論，中共不甘示弱，挺身爲「三個世界」理論作辯，稱之爲「國際無產階級在當代的正確的戰略規定和策略規定」^①。從此，雙方論戰不休，關係惡化。馴至

註① 「中共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大公報」（香港）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中共「外交部」照會阿駐北平使館，「列舉大量事實，指出阿着意設置種種障礙，製造事端」，因而停止對阿援助，撤回專家。七月二十九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及阿爾巴尼亞人民社會主義共和國部長會議」函覆中共，批駁中共所提指責，並列舉過去中共與阿共間不和事實。至此，雙方「友好」關係正式告終。

中共與阿共決裂過程和當年中共與蘇共衝突經歷頗有雷同之處。雙方基於不同的客觀條件，在戰略與策略上產生了各異的主觀見解，較強的一方企圖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較弱的一方，後者不甘屈從，前者遂停止各種援助迫使對方就範，終而導致決裂。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共當年之所以反蘇，是因為蘇聯對「馬列主義」教條作了重大的修正，因為蘇聯與「現代修正主義」始祖南斯拉夫狄托妥協；阿爾巴尼亞如今反對中共，也是因為中共的「三個世界」理論違反了「馬列主義」，因為中共不僅向南斯拉夫妥協，而且更向其學習。

中共與阿共因何又如何聯合？因何又如何分裂？以及它們分裂後有何影響？本文試就這些以及一些有關的其他問題加以析述。

中共與阿共因反蘇而聯合

一九四四年當義大利與德國撤離阿爾巴尼亞時，霍查（E. Hoxha）與其共黨所統領的「民主陣線」成功地清除了大部分反共組織，當年九月組成了「革命政府」；一九四六年宣佈為「人民共和國」。在取得政權前，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一九四八年前稱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原在南斯拉夫共黨的直接領導之下。

南斯拉夫與阿爾巴尼亞的關係向來不睦，其主要原因在於種族的差異、領土的爭執，以及巴爾幹半島上的政治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軸心國佔領巴爾幹時，兩國共產黨游擊隊因共同利益而合作，因此在戰後兩國政府間才建立了正常關係。之後，至一九四七年，南斯拉夫共黨頭子狄托（Josip Tito）已表露出大南斯拉夫主義的企圖，欲成立巴爾幹聯邦。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被逐出「共產黨情報局」，阿爾巴尼亞藉機與南斯拉夫斷絕關係。自一九四八年七月起，蘇聯代替了南斯拉夫在阿爾巴尼亞的地位，變成阿爾巴尼亞的保護者。在史達林有生之年，阿爾巴尼亞隨聲附和蘇聯猛烈攻擊南斯拉夫，有如後來隨着中共攻蘇聯一樣。史達林死後，蘇聯對南斯拉夫政策變更，且進行貶史運動。加之，狄托此刻力圖對東歐政治施加影響力。這對阿爾巴尼亞構成了威脅。同時，阿爾巴尼亞對內也祇有繼續使用史達林的高壓方法才能保持控制權。

一九五七年，霍查在阿共中央全會上發表了為史達林辯護的演說，這篇演說構成了爾後阿蘇共分裂的理論基礎。一九五七至六〇年間，阿蘇間的相互攻擊，在祕密中進行；地拉那與北平間的各種連繫逐漸形成，中共駐阿爾巴尼亞使館人員大增。一九六〇年蘇阿歧見逐漸表面化，阿爾巴尼亞共黨首腦未親自參加布加勒斯特東歐高層會議，同時阿共內部整肅活動以及關於「修正主義」的學術辯論日益強烈。此時，中共與蘇共間也有着嚴重的分裂。

一九六一年，蘇共舉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阿共未獲邀請參加，此舉在共產世界中含義極為重大。大會上，赫魯雪夫復嚴厲攻擊阿共領導，中共代表周恩來挺身支持阿爾巴尼亞並譴責蘇聯某些政策，發言後即離開莫斯科。同年，據阿爾巴尼亞宣稱，蘇共曾支持阿爾巴尼亞內部的一項政變，陰謀推翻霍查政權。於是，雙方黨政關係正式決裂。

蘇聯勢力退出阿爾巴尼亞後，中共成為阿爾巴尼亞的護衛者，並適時給予有效的援助，使後者安然渡過因蘇援中斷所帶來的危機。另一方面，中共與阿共聯盟，對中共而言，是北平與莫斯科爭執中的一項重大勝利，這表示毛共主義對蘇聯勢力範圍內的一個小國家具有吸引力。在「文化革命」期間，中共在全世界的孤立形勢達於極點之時，祇有阿爾巴尼亞是中共的唯一的親密盟友，作用極大，且成為同情中共的共黨或分裂派的集合地、宣傳站、活動基地。因此，阿共第五次代表大會時，毛共賀電中曾說：「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從下面兩段話，更可看出它們之間的互依關係。

霍查說：「……阿爾巴尼亞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將永遠不會忘記，中國兄弟毫不吝惜地援助我國人民，把口糧分給我們……我們兩國和兩黨之間的友誼將萬古長青……」②

周恩來說：「我願意在這裏指出，首先是阿爾巴尼亞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和援助。……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阿爾巴尼亞人民，在極艱苦的條件下，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鬥爭，堅持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③。」

中共接近美國令阿共不滿

中共與阿共的「友誼」並未「萬古長青」。

雙方反目的原因絕非一端，但是北平試圖與華盛頓接近乃是主要的引發條件。一九七一年中共開始接近美國，阿共頗不以爲然，其後中共由於內部不穩定，無力加強世界「馬列主義」運動也令阿共氣憤。一九七五年初，鄧小平初次復出曾引起阿共不滿，在阿共眼中，鄧小平乃是「未被改造的右派分子」，是「文革」的反對者。可以想像，毛澤東死後，中共清算「四人幫」與鄧小平二度復出，當益使阿共不快。中共邀請阿共世仇狄狄訪問中國大陸，簡直是給予阿共的一次懲戒。在上述種種情形下，阿共忍無可忍，乃於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發表批評毛共「三個世界」理論的文章。

「三個世界」理論在七十年代以後是中共對外政策的理論基礎，一九七四年毛澤東正式提出，接着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就這個理論發言。他說：「從國際關係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着相互聯繫又相互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④。」美

註② 「霍查的談話」，「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

註③ 「周恩來的談話」，「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

註④ 「三個世界理論的力量和影響」，「大公報」（香港），一九七七年八月廿七日、廿八日。

國和蘇聯是「第一世界」；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按照中共自己的解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形勢的發展大概經歷了兩個階段。一九四〇年代與一九五〇年代，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相互對立。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以後，國際形勢大變，發展中國家興起，西方集團內部分化，蘇聯變為「社會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⑤。這就是「三個世界」的基本論點。

阿爾巴尼亞共黨機關報的論文對「三個世界」理論所提出的批評可歸納為五點^⑥：(一)「三個世界」理論忽視了當代的基本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同時也違反了「辯證與歷史唯物主義」。(二)「三個世界」理論忘記了「革命事業為主，民族問題為從」的原則，以致把「民族解放運動」而非「共產運動」視為對「帝國主義」鬥爭的主力。(三)「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掩飾了階級矛盾，強調維持現況，企圖建立赫魯雪夫式的「和平共存」。(四)「第二世界」這一概念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即共產主義)國家混為一談。但是從社會秩序的觀點看，它們與兩個超級大國沒有基本的差異，也不可能成為第三世界的盟友。(五)根據「兩個超級大國」(第一世界)之說，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比美國「帝國主義」可怕，阿共認為這是欺人之談，兩個超級大國實際上具有相同的危險性。因此，在對待兩個超級大國時，決不能應用「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這個原則。換句話說，阿共反對「聯美制蘇」的策略。

在這篇以及其後幾篇文章中，阿共尚沒有指名批判中共，但是「三個世界」理論係中共提出，所以任何人一看就明白，阿共指責的對象為中共。中共對此批判也未等閒視之，中共頭子不僅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三個世界理論予以肯定^⑦，而且發表專論對此項理論詳加闡述^⑧。至此，阿共黨與中共間的意識形態之爭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中共停止軍經援助、撤回專家

在阿爾巴尼亞發表批判「三個世界」理論的整整一年之後，中共照會阿爾巴尼亞駐北平大使館，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停止支付對阿爾巴尼亞的援款，接回在阿爾巴尼亞工作的中共經濟和軍事專家。同時，中共宣佈，雙方合作關係遭到破壞，完全是阿方造成的，「全部責任只能由阿方承擔」^⑨。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革命的理論與實踐」，原載 *Zeri i Popullit* (「人民之聲」)，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地拉那七月七日 AT4 英語廣播。

註⑦ 見註①

註⑧ 見註④

註⑨ 「我被迫停止對阿援助和接回專家」(「外交部」照會)，「人民日報」，一九七八年七月十四日。

中共的「照會」透露，從一九五四年起，中共應阿爾巴尼亞的要求，向阿方提供了軍、經援助。要者如下：(一)中共爲此需要花費「人民幣」一百多億元，其中絕大部分已經交付；(二)協議援阿成套項目一百四十二個，已完成九十一個，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設的二十三個，已經考察和進行設計的十七個；(三)無償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四)先後向阿爾巴尼亞派出過近六千名專家，並爲阿國培養了大批經濟和軍事骨幹。以上援助，是在中共自顧不暇的情況下勉力提供的，例如，中國大陸人民糧食不足，中共却把一百八十萬噸糧食輸往阿爾巴尼亞；自身鋼材不夠用，還向阿方提供了一百多萬噸鋼材；自身農業機械化水平還低，却向阿方提供了一萬多台拖拉機^⑩。

依照中共的說法，它對阿方越來越多的要求，「無法一一滿足，不可能要什麼就給什麼，要什麼時候就給什麼時候給」。同時，近幾年來，阿爾巴尼亞屢次對中共的內政外交政策進行影射攻擊；從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阿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以來，公開攻擊中共及其領導。中共認爲，阿共由於對內對外的政治需要，加強反對中共，同時又肆意破壞雙方經濟和軍事合作。中共在「照會」中舉出了今年上半年內所發生的八個不合作事例，並下結論說，種種事實表明，阿爾巴尼亞領導決心在反中共的道路上走下去，蓄意背棄雙方簽訂的協議，污蔑和陷害中共專家，破壞經濟和軍事合作，使中共的援阿工作無法進行下去，因而宣佈停止一切援助^⑪。

中共發出「照會」不久，阿爾巴尼亞立即予以反駁。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及阿爾巴尼亞人民社會主義共和國」名義聯合函覆中共，並將該函連同中共的照會一同登在阿共的機關報上^⑫，並要求中共也將此函公開發表。這封信長達兩萬字左右。中共迄未予以公佈。

阿共說，中共片面停止軍經援助召回專家的行爲，粗魯地與武斷地違反了基本的國際法與國際準則，把意識形態之爭擴及於兩國的關係之上。此一敵對步驟乃是企圖破壞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與國防能力，其所作所爲的內容與形式無異是狄托、赫魯雪夫、布裡茲涅夫等沙文主義方法的翻版，中共從前也曾一度譴責過這種方法。阿爾巴尼亞辯稱，阿爾巴尼亞是個小國，沒有理由迫使中共終止經濟合作，拒絕接受一般的及軍事的貸款與援助；阿爾巴尼亞也從不把與其他國家友好視爲經濟利益的工具，從不出賣自己的原則。本着這個立場，阿共曾於一九六〇年在羅馬尼亞首都所召開的各國共黨會議上維護中共反對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立場，并且多年來，在聯合國維護中共的「權利」，支持中共「文化革命」的戰略目標^⑬。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同註⑨

註⑫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及阿爾巴尼亞人民社會主義共和國致中共中央及國務院函，「人民之聲」，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地拉那「人民之聲」英語廣播，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

註⑬ 同註⑫

阿共指責中共在「照會」中所列舉的論證與八項事實純屬捏造歪曲之詞；即使所言不假，也不足構成對一個長期親密盟國片面停止援助的理由。因此，停止援助的動機絕非技術性的，而是含有深刻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性質。在中共的「照會」中，充滿自我吹噓之詞，宣揚其對阿爾巴尼亞所作過的援助。爲了這個目的，中共故意把數字誇大。例如，中共自稱曾爲阿爾巴尼亞花費一百億元「人民幣」，完全與事實不符。根據阿共的計算，祇有三十億零五千三百萬元。中共援阿的各項工程項目也從未按期完成，拖延一至六年不等，有的項目至今尚未完成。中共所列援阿糧食數字也不確實，援助部分實際上只有四十多萬噸，其餘都是循商業途徑購買的。中共特別提到，曾派遣六千名專家赴阿，但故意不說明這是二十四年中的總數。也隻字不提他們在阿爾巴尼亞所享受的優厚待遇。最近，當中共從阿爾巴尼亞撤回專家時，所有援阿工程項目的藍圖不是被毀掉，就是被中共專家帶走。

中共與阿共間充滿矛盾的聯盟

中共與阿爾巴尼亞起初因反對蘇聯赫魯雪夫「修正主義」而結盟，在將近二十年的「親密關係」中，實際上也是歧見重重。但是，在雙方公開交惡之前，這些矛盾鮮爲外人知曉。如今，在阿共反駁中共「照會」的信中暴露了不少實情。茲舉其要者於後。

反「現代修正主義」的態度不一。阿共自稱，於「共產黨情報局」譴責狄托主義之前，阿共已開始反對「現代修正主義」，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出現後更是如此。中共當時態度雖然搖擺不定，但對赫魯雪夫恢復狄托名譽一事仍大加譴責。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會議與莫斯科八十一個共黨會議是「馬列主義」與赫魯雪夫「修正主義」正式分裂的開始，當阿共堅決「反修」之時，中共未能採取明顯的反赫立場。表面上，中共聯合阿共反對「蘇修」，實際上在謀求與「蘇修」和解。

「反帝」陣線應否包括蘇聯，各持己見。一九六二年六月阿共代表訪問北平。會談中，中共認爲「反帝」陣線必須包括蘇聯；阿共認爲，「反帝」而不同時「反修」，「反帝」就不可能獲得勝利。中共辯稱，「反對美帝」必須聯合所有的人；當時鄧小平曾對阿共代表說，「赫魯雪夫不可能變成狄托……蘇聯作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永遠不會改變的」^⑭。至一九六三年八月英、美、蘇簽訂部份核子禁試條約時，中共迫不得已才與赫魯雪夫公開爭論。可以說，中共在與蘇聯謀和失敗後，才開始真正反對赫魯雪夫主義，同意阿共的原則性鬥爭。

阿共反對在中（共）蘇爭執中，提出領土問題。一九六四年夏，中共大肆宣傳中蘇邊界問題。阿共對此舉表示不能苟同，認爲提出邊界問題，無補於反赫的意識形態鬥爭，反而予蘇共以有利的反中共武器。於是，阿共勸中共放棄此一主題以免授人以柄與揭

註⑭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中共阿共會談紀錄」；轉引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阿共致中共函」，見註⑫。

發舊瘡疤^⑮。但是，中共置之不理。

赫魯雪夫下台，中共試圖與蘇和好，遭阿共反對。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被推翻下台，重新燃起中共與蘇共和解的希望。十月廿九日周恩來向阿方建議，雙方同派代表團赴莫斯科支持以布里茲涅夫爲首的蘇聯新領導；並謂，中共已向蘇聯建議，邀請阿爾巴尼亞參加當年十一月七日蘇聯的「十月革命紀念」。此時，阿共與蘇聯早已斷絕一切外交關係。因此，阿共函覆中共說，赫魯雪夫雖然下台，但粉碎「現代修正主義」的原則性鬥爭不應終止，阿共也無意派代表團前往莫斯科^⑯。最後，周恩來還是帶了代表團參加當年十一月七日蘇共的慶典，但事實證明，此舉未能促進雙方修好，不久中共祇好恢復與蘇共的論戰。

阿共應允支持「文化革命」總路線，但不同意其指導原則與方法。文革之初，毛澤東對阿共代表團說，中共面臨極大危機，無人可知，社會主義勢力抑或修正主義將會獲勝，因此，要求阿共支持文革^⑰。阿共答應支持文革的總路線與戰略，但不同意其指導原則、方法與策略，不贊成不擇手段的宗派主義鬥爭。如今，中共領導又要阿共攻擊文革，阿共不僅拒不答應，而且要求中共對文革作出真正的分析，勇敢地把指導文革的思想昭告於世。

中共外交上採取關門政策，不聽阿共忠告。阿共在國際舞台上多次袒護中共，而中共在對外關係上却採取關門政策。阿共曾勸中共，在外交上應積極起來，擴展與他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其他接觸與關係。中共領導認爲這些勸告不合理，堅執其孤立政策。

捷克事件後，中共拒不援助阿共，反令其與南、羅軍事結盟。一九六八年九月阿爾巴尼亞副總理兼人民防衛部長巴盧庫（Beqir Balluku）率團訪問中共，要求軍事援助以增加阿爾巴尼亞的國防力量。周恩來對巴盧庫說，阿爾巴尼亞是個小國，不需要重型軍備；不論中共給予多大軍事援助，皆不可能防阻「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或美國的攻擊；因此他建議阿共：（一）國內採用游擊戰術；（二）對外與南斯拉夫及羅馬尼亞結成軍事聯盟。阿共中央斷然否定此一建議，巴盧庫本人當時雖表示服從阿共政治局決定，但後來事實證明，他暗地裏同意中共建議，祕密執行這一戰略計劃^⑱。阿共說，中共曾非法干預阿爾巴尼亞內政；一遇適當時機，阿共將把這些事實公諸於世。

中共外交戰略劇變，事先未與阿共諮商。阿共指責說，中共反「蘇修」並非爲了保衛馬列主義，而是爲了一些自私自利的目的

註⑮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阿共致中共函」；轉引「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阿共致中共函」，見註⑫。

註⑯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阿共致中共函」，見註⑫。

註⑰ 一九六六年六月「與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談話紀錄」，見註⑫。

註⑱ 在阿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霍查親自宣佈，在阿國內發現並殲滅——若干敵對集團，其中之一就是巴盧庫反叛集團，企圖藉軍事政變推翻阿共中央領導，並依賴外來的武裝干預。

，這由一九七一年夏中共外交戰略的劇變可以獲得證明。季辛吉祕訪北平，阿共係從外電獲悉。中共事先並未與阿共磋商，聽取阿共意見；祇欲阿共追隨其戰略與策略。阿共激烈反對中共的聯美政策，並以長信送達中共^①，表明反對中共的轉向；中共一如往昔，不予理會。實際上，兩黨的接觸已逐漸減少，最後祇剩下純粹的普通關係。阿共指出，中共戰略的轉變乃是內部鬥爭的結果。阿共認為一九六二至一九七二年十年間的中共對外政策歷經三次變化：起初企圖與蘇聯及其他「修正主義者」組成「統一戰線」對付美國及其盟邦；其次，提出組織「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對抗美帝、蘇修及一切國家的反動者」的口號；迨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中共仍高叫「廣泛的統一戰線」，不過其內容已經是：聯合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包括美國在內，對抗蘇聯社會帝國主義。

「三個世界」理論引發了公開的意識形態之爭。中共與美國接近後，提出「三個世界」理論。阿共指出，中共提出這個理論，乃是欲以「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無政府工團主義」等思想的混合物代替「馬列主義」。這個理論一方面欲維持世界現狀，一方面欲在所謂「第三世界」中取得霸權。「三個世界」理論的實踐，導使中共與「魔鬼」聯合，與狄托、卡里諾等修正主義者為友。中共曾一度反狄托，現在竟與他聯合，可見中共沒有任何原則。

阿共力圖消弭歧見，中共不予理會。為消除雙方歧見，阿共曾屢次作出努力，中共不是不作答覆，就是拒派代表談判。一九七四年初，阿共建議在當年上半年雙方派高層代表團會談，中共雖正式同意此一建議，但把時間延至一九七四年下半年，然後又延至一九七五年上半年，最後就乾脆不提了。顯然，在對阿爾巴尼亞關係上，中共表現出大國沙文主義態度，要阿共無條件地接受它的路線。因此，阿共堅守其獨立政策，反對中共的大國路線與政策，才是中共武斷地停止對阿爾巴尼亞軍、經援助的真正原因。

阿共不支持中共高層領導的人事更迭，令中共不滿。阿共透露，現今中共領導要求阿共支持中共高層人事的變更，阿共未應允，因此中共說，阿共和林彪和「四人幫」是一伙的，這也是停止對阿共援助的不可告人的原因。

結語

剖析阿共與中共合與分的經過，可以發現，它們的聯盟的工具性大於意識形態的認同。南斯拉夫威脅阿爾巴尼亞的安全使阿共先天地仇恨狄托，蘇聯與南斯拉夫和好引起阿爾巴尼亞的反對，也導致蘇共與阿共的分裂。此時適逢中共與蘇共因在「革命戰略」等問題上分歧演成對立，於是，阿共與中共自然地形成盟友，阿共亟需中共援助以代替失去了的蘇援；中共需要一個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伙伴以免在其與蘇共鬥爭中陷於絕對孤立。在「合作」過程中，中共對阿共一派「老大哥」作風，阿共顧及經濟利益而予容忍；阿共對中共也屢屢暗中批評，中共也因形勢孤單而隱忍不發。如今，中共外交策略改變並廣結與國；阿共國內經濟也略具

註① 一九七一年八月六日「阿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見註②。

基礎，因此累積的矛盾終於演變為公開的分裂。目前，雙方祇維持着純粹的普通關係。

中共與阿共分裂後，各地親毛共黨勢必跟着分裂。中共與蘇共分裂後，世界各地共黨也經歷過分裂，出現了所謂親毛共黨或親毛分裂黨派。例如，一九七六年時，全世界約有九十一個共黨，其中五十一個親蘇，八個親毛，十八個含有親毛分裂派，十四個中立^②。一九七六年十一月阿共舉行第七次代表大會時，計有三十一個共黨派代表前往參加，其中除韓共、越共、寮共等當時在中共與蘇共之間尚採取中立態度外，其餘皆為親毛共黨或親毛分裂派。它們在理論與實踐方面雖然認同毛路線，但是實際去過中國大陸的很少，去過阿爾巴尼亞的反而較多。多年來，不是北平而是地拉那才是各地親毛派共黨的聖地和活動基地，地那拉無線電廣播台是世界上最強力電台之一，不斷以各種主要語言向世界各地廣播。如今中阿共業已分裂，親毛共黨陣營勢必一分為二。另外，一些反蘇修共產黨徒正徬徨歧途，究竟誰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蘇共、中共、抑或是阿共？它們一時無法確定。

中共與阿共交惡，蘇聯喜出望外，但蘇阿關係尚難恢復。中共與阿共不和後，凡是阿共攻擊中共的重要文件，蘇共報紙與廣播皆加以轉述。顯然，蘇聯一方面企圖擴大中共與阿共的裂痕，一方面企圖與阿共和好。近年來，蘇聯經常在不同場合表示，欲與阿爾巴尼亞恢復外交與貿易關係，曾建議以「和平共存原則」為基礎重建兩國關係。布里茲涅夫甚至說：「我們不相信有令我們跟這個國家相隔離的客觀因素^③。」但是，蘇阿關係至今未獲任何改善。如今阿共雖然與中共分裂，但是短期不會與蘇共修好，原因是（一）阿共誓言，繼續其「意識形態鬥爭」，（二）阿共頭子霍查本人痛恨蘇共，在其當政期間，不易與蘇聯復交。最近，霍查於九月二十日宣佈，阿爾巴尼亞準備與所有尊重阿國獨立的國家建立或維持友好關係，但特別剔除了美國、蘇聯與中共^④。

阿爾巴尼亞可能向印度等國尋求援助。中共停止援助阿共後，阿共業已表明不願轉向美國或蘇聯，但沒有排除與西德及英國等建立較親密關係的可能。目前，阿爾巴尼亞最感興趣的還是印度^⑤，阿共領袖一直注意印度的對外政策，並評估印度技術與經濟援助的可能性。事實上，印度雖然尚是一個接近「開發」邊緣的國家，而且很窮，但是技術與經濟援助却是其對外政策的手段之一，目前約有二萬名技術人員、科學家及專家在第三世界（不含拉丁美洲）工作^⑥。對印度而言，援助二百多萬人的阿爾巴尼亞或可游刃有餘。

註② 艾非莫夫（V. Efimov），「阿爾巴尼亞解放紀念日」，「消息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註③ 「基督箴言報」，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第十頁。

註④ 同前註。

註⑤ 「基督箴言報」，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五日，第六頁。

註⑥ 史塔爾（R. Starr）編，「國際共黨事務年鑑」（史坦福：胡佛研究所，一九七六），導言第十五——二十頁